

他从改革的风雨中走来

——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周 锡 生

1997年1月2日，一阵凄厉的风雨过后，纽约碧空如洗，阳光和煦。位于纽约市城东河畔的联合国大厦，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雄伟庄严。这是联合国跨入1997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上午10时，一位西装革履的黑人男子乘专车来到联合国总部门前，接受联合国仪仗队简短而又隆重的迎接。随后，他乘电梯登上位于顶层38楼的秘书长办公室，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坐下，戴上眼镜，正式开始他新的工作。他，就是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

国际风云赋予他历史机遇，他为联合国创造了三个“第一”

这一天，是联合国难忘的一天，安南的上任，为联合国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世界舆论不约而同地把焦点对准了联合国，对准了安南——一位来自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加纳人。世人关注他，是因为他的到来为联合国创造了有史以来的三个“第一”：第一位来自非洲的黑人秘书长；第一位从联合国基层做起，因功绩卓著而擢升为最高行政长官的秘书长；第一位将带领联合国跨越两个世纪的秘书长。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国际风云中，为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际安全和促进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世界在发生巨变，但联合国在未来的岁月里仍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联合国秘书长历来特别引人注目，竞选牵动着国际舆论的神经，而安南的当选则更富戏剧性。

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联合国大会任命。根据会员国多年来达成的共识和默契，秘书长由各大洲轮流派人担任，一般情况下均可连任一次。安南的前任、出生于外交世家的埃及人加利精明强干、身体健康、建树不小，他本人志在蝉联，国际上也普遍认为他的连任顺理成章。然而，由于加利在处理联合国的一些维和问题时与美国发生了矛盾，并对美国长期拖欠联合国的巨额会费公开提出尖锐批评，得罪了美国。于是，在1996年6月也即加利第一任期届满前的半年，美国以联合国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改革不力为借口，突然表示坚决反对加利连任。之后，虽然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一致决定推举加利竞选连任，埃及等国也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由加利连任，但美国执意要将加利搞下台。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加利从大局考虑，宣布中止竞选，让非洲的其他候选人竞选。后来，经非洲国家提名以及安理会七次秘密投票和反复协商，当时负责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安南被推荐为新一届联合国秘书长。1996年12月17日，由185个会员国的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大会以热烈的掌声通过了对安南的任命。

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政治风云把安南推上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宝座，为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丰富的联合国工作经验，他不愧为秘书长的合适人选

头发灰白、眼睛炯炯有神的安南，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字斟

句酌，对人谦和礼貌、温文尔雅。记者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在许多场合经常见到他，感到他思路清晰、反应敏锐。在联合国大厦内，人们称赞他为“杰出的非洲人”、“出色的国际政治外交家”。他的英语、法语讲得都非常地道，回答记者提问时，可以随时变换使用这两种语言。有时遇到非洲记者提问，他在回答时还会穿插几句非洲方言。据安南的发言人办公室介绍，安南可以流畅地讲好几种非洲方言。

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比较保守的一点是一般不接受新闻记者的单独采访。但对中国记者，他给予了特殊照顾。在香港回归前夕，安南在他办公室隔壁宽敞的会议室里接受了我们几位新华社记者的独家采访。他很随和，采访开始前，他和我坐在一起，愉快地回忆了前不久对中国的访问，并感谢中国的一种中药丸神奇般地为他治好了嗓子疼。采访中，安南畅谈了香港回归中国的历史意义，强调香港的顺利回归对国际上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很有借鉴作用。他表示深信，香港回归中国后一定能保持繁荣稳定。几天后，安南不顾某些大国的抵制和“劝告”，毅然前往香港，参加了香港回归庆典。

联合国是一个庞大的机构，除了纽约总部外，还有日内瓦、维也纳和内罗毕等几个分部，仅主体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多达1万多人。联合国的工作领域广泛庞杂，包括维和、裁军、环保、人权、发展、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救援等各个方面。联合国的185个会员国有穷有富、有大有小、有强有弱，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利益追求各不相同。有人说，联合国犹如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作为秘书长，必须具有非凡的组织、协调和掌控能力，才能保证这个乐队奏出和谐协调的乐曲。安南执掌联合国以来，联合国内外舆论有口皆碑，人们普遍认为当初任命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较之六位前任，安南最大的不同是他在联合国系统工作了

30多年，谙熟联合国的内幕和运作规律，在秘书处有很多同事和朋友，与众多的会员国有过直接的接触，懂得如何同方方面面打交道，化解矛盾、解决难题。

1962年，24岁的安南首次进入联合国，在总部设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担任行政和预算官员。之后，他在联合国的阶梯上步步高升，一路春风。除了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分部工作过外，他还曾任职于设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开罗等地的联合国分支机构。从工作的领域讲，他接触过行政、管理、预算、财务、人事、维和和难民事务等部门。他曾担任过联合国负责计划、预算、财政和控制的助理秘书长，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和联合国系统安全协调的助理秘书长，联合国财政服务局预算部主任，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行政管理和人事局长。90年代后，安南职位高升，成为负责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官员。

安南处事沉稳，做事有板有眼，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温和中透着坚毅。在负责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期间，他显示了非凡的外交协调才能。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以往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和对抗的局面，逐渐被大量地区冲突以及会员国内部的宗教、民族和种族纠纷所替代。联合国为制止动乱、维护和平，增加了大量维和行动。在联合国迄今所采取的40余项维和行动中，近30项发生在冷战结束以后，而且大多是在安南掌管联合国维和行动之后所采取的。在采取这些维和行动时，安南既采用行之有效的传统手段，又不断研究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和新情况，尝试以预防冲突、外交协调和加强冲突后的和平建设为主、军事干预手段为辅的新办法。在解决冲突时，安南首先着力于外交对话。为了有效地监控和协调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安南督促联合国成立了“国际形势昼夜监控室”；为了加速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部署和行动，安南与会员国广泛协商，制定了建立“联合国快速部署行动指挥

部”的计划。在安南的号召和劝说下，已有 60 多个会员国明确承诺愿为总人数为 8 万的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提供人员、装备和后勤服务。

解决国际纠纷既要耐心，又要讲究策略。安南可谓两者兼而有之。因此，他在负责联合国维和行动期间，多次受秘书长的委托，前去冲突地点召集有关各方谈判，在冲突各方之间进行斡旋。伊拉克与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协议，就是由安南首先倡议并促成的。安南常常说，他凡事希望平和解决，不要发生冲突或纠纷，不要激化矛盾。安南在长期担任联合国高级官员时养成的温和性格和练就的外交协调能力，对他现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工作极有帮助。

改革犹如走钢丝，但他保持了联合国改革的平衡

成立于 1945 年的联合国，其内部结构、运作机制和努力方向主要是按照二次大战结束时的国际形势、安全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所确定的。经过 50 多个春秋的运转磨合，联合国这台机器日益显示出它的不适应性。改革既是联合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广大会员国共同的愿望和呼唤。

安南是在联合国改革的大潮中走马上任的，因此，他的首要和主要使命是领导改革、推进改革。然而，联合国的改革是一项复杂、棘手、浩大的工程，牵涉到联合国的各个领域和部门，关系到 185 个会员国的切身利益。在改革问题上，既有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矛盾，又有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分歧；既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争夺，又有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讲，联合国的改革实质上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利益再分配，因此有关各方互不相让。对安南来说，领导联合国的改革犹如走钢丝般艰难，稍不谨慎或有闪失，都会从晃荡的钢丝上滑落下来。推进改革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对于安南能否经受住这场考验，联

合国内外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但安南是老练的，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他既不退让畏缩，也不鲁莽激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注意在各方之间搞好平衡。安南上任一年来，唱的是“三步曲”。

第一步：利用一切时机大力强调改革，在联合国内外营造浓厚的改革气氛。在接受联合国大会任命之后，在上任后的许多次记者招待会上，在同联合国总部的员工座谈时，在出访会员国时，安南都强调联合国必须进行改革。他诚恳地说，联合国成立 50 多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新的全球性问题正在不断出现，人类在和平、安全、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面临新的挑战，国际社会变得更加相互依赖。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必须审时度势，励精图治，否则将无法迎接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的新挑战。安南认为，对联合国的改革，每一个会员国都应该欢迎和拥护，而决不能拒绝和对抗；改革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需要会员国顾全大局，达成共识，而不是某些大国一厢情愿、为所欲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改革是一项综合工程，首先是要增强会员国对联合国的承诺和义务感，而不能片面地强调为大砍经费预算、大裁人员和大减机构。为了唤起国际社会对联合国改革的关心和支持，安南在本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开始前破例作了引导性发言，呼吁会员国在辩论中把改革问题作为中心议题，要求各国共同努力，把此次大会开成“改革的大会”，以便各国就改革蓝图达成共识，尽快正式推进他所领导的改革进程。

第二步：主攻美国，安抚西方大国，认真听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和要求。安南同美国的关系是微妙复杂的。众所周知，在 1996 年底的秘书长角逐中，如果没有美国的鼎力支持，他恐难获胜。美国作为联合国中承担最多会费的国家 and 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联合国具有特殊的份量。这些因素，迫使安南对

美国的改革要求不得不认真考虑。但与此同时，美国在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为所欲为、称王称霸的做法，又使安南颇感为难。由于美国一个时期来带头拖欠巨额会费，联合国走到了“财政崩溃的边缘”，内部运转濒于混乱。安南深知，要稳定联合国，要使联合国的改革取得预期的成功，必须首先把美国作为主攻方向。因此，他上任伊始就首先亲赴华盛顿，诚恳耐心地劝说克林顿政府和美国国会早日补缴拖欠的会费，支持他的改革运动。安南还向美方全面通报了他的改革设想，并不时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以及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中有影响的议员邀到联合国，商议改革大事。对美国一些过度的做法，安南尽量避免公开评论，防止授人以柄、激化矛盾。这种积极主动、谨慎小心的做法虽不能改变美国保守强硬派的立场，但使他们在国际舆论面前显得傲慢无理，陷入孤立。对于英、法、德、日等西方大国及俄罗斯，安南同样注意搞好关系。他在上任后不久的“组阁”以及后来的秘书处高级职位调整中，都尽可能把一些较重要的职位让给了这些大国的官员，以换取它们在一系列改革问题上对他的支持和配合。

安南来自加纳的库马西市。他虽然在美国和瑞士等西方国家深造多年，但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加纳度过的，大学也是在本国上的，因此他对非洲国家和人民的疾苦有着切身体会。安南上任后不久，即前往非洲一些国家访问，了解情况，倾听非洲国家的要求和呼声。针对近年来联合国重维和轻发展的片面倾向，安南明确指出，“促进发展依然是联合国组织的中心使命”，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工作“必须得到加强”。他一再恳切地呼吁西方大国真正重视发展援助问题，把资助发展中国家看作是推卸的职责和义务，而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包袱。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出了增加联合国发展援助资金的改革方案。在他的推动下，联合国在1997年通过了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纲领》。

第三步：通过“双轨制”办法推进改革进程。鉴于联合国改革的艰难复杂性，安南在组织专门的改革班子，广泛征求会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分两步提出了改革方案。第一步改革方案所涉及的主要是秘书长职权范围的事，重点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人员精简、机构撤并精简和经费裁减等。实际上，这是安南为下一步方案抛出的试探气球。这一方案出台后，各方反应较好，会员国大多认为比较稳妥，没有像有些人事先所担心的那样“把联合国搅个天翻地覆”，方案“显示了安南稳健、务实和谨慎的作风”。但美国国会内的保守强硬派指责安南的改革步伐过小，对安南感到失望。事隔四个月，安南抛出了他的第二步改革方案。这是一项“一揽子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了第一步方案中的大部分内容。方案长达九十多页，洋洋数万言，几乎涉及了联合国的所有领域和部门。归纳起来，共有 29 条改革措施和 15 条改革建议。措施基本上都是安南可以拍板定调的，只需联合国大会形式上认可一下即可。但 15 条改革建议则比较复杂重大，包括增设一名常务副秘书长的提议，必须经过大会的审议和批准后方可实施。

对这项一揽子改革蓝图，联合国内外的反应是复杂的。美国等西方大国大加赞赏，克林顿总统在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首先发言，称该方案是联合国走向 21 世纪的“正确蓝图”。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理查森四处游说，劝说人们支持这项方案。鉴于美国的压力和碍于安南这位来自非洲的新秘书长的情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公开场合不得不表示支持，但在私下和小范围议论时则持保留态度。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他们认为这项方案基本迁就、迎合或反映了美国的改革要求，偏重于裁减机构、精简人员和削减经费，而对发展中国家所期盼的发展援助重视不够；二是方案虽大而全，但避重就轻，原则强调多，具体步骤少，尤其是避开了安理会改革等实质性问题。由于有较多的保留，安南原指望本届联大能很快就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通过决议，结果没

有成功。安南仍在做工作，并对方案的建议部分作适当修改，以争取尽早达成共识。不过，也有人认为，安南先易后难地推进改革是明智的，反映了他对联合国改革复杂性的清醒认识，现在联合国的改革火候还不到，如果此时提出的方案过于具体、深入，必然引起很大争议，搞不好会“翻船”。

能否稳定走向 21 世纪，关键还要看美国

安南秘书长的任期为 5 年，到 2001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他上任一年来，给联合国注入了活力，带来了希望。然而，安南能否驾驶联合国这艘航船平安驶向 21 世纪，却不得不令人担忧。

眼下，联合国的问题依然成堆，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是财政危机。联合国不可接受任何直接的外来资助，经费来源主要靠会员国的会费和其它征收款。据最新统计，会员国拖欠联合国的会费多达 25 亿美元，其中美国一家就占了百分之六十。美国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愿付费。美国的公开理由是联合国现行的会费分摊比额不合理，美国承担过多，必须重新确定。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操纵联合国，把联合国当作它在全球各地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工具。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增强，美国在联合国内为所欲为的图谋和行为越来越难得逞，于是心里感到委屈，不愿再按现行会费分摊比额缴费。美国自诩为“世界领袖”，在它看来，它应该凌驾于联合国之上，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联合国“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和霸权心态的驱使下，美国近年来不断提出改革要求，对联合国秘书长施加压力。对安南更是如此。最近一年来，安南为劝说美国补缴会费作了多种努力，并且在改革方面迁就了美国的许多要求，但美国得寸进尺，立场毫不松动。最近，美国国会又将补缴联合国会费同反堕胎等毫不相干的美国内政问题联系在一起，再次拒绝了克林顿提出的要求部分

补缴会费的提案。安南对美国的态度深感失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对美国公开提出了批评。现在，联合国只能靠挪用维和经费来应付日常开支，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终究不是长久之事。如果美国顽固拒绝缴付会费，联合国深陷经济危机，安南的任何改善和改革努力都难以取得成功。

在发展援助方面，安南也是困难重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联合国内部热衷于强调的是保护所谓的“人权”，而对于发展援助问题却不予重视，发达国家所承诺的发展援助资金不断下降，1996年降到了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零点二五的历史最低点。联合国官员估计，今年这一援助比例有可能进一步下跌。安南在改革方案中提出，联合国秘书处每年削减数千万美元的行政开支，节省部分用以资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毋庸置疑，安南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但这笔经费在发展援助方面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对安南来说，要真正改变联合国的面貌，增强联合国的作用，满足广大会员国的期望无疑是十分艰难的。但他只能坚定地往前走，没有后退之路。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既然他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就有成功的希望。

守孝三年 正式接班

——金正日就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黎 能 清

1994年7月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与世长辞。在此后的3年里，朝鲜全国上下，为失去他们的伟大领袖举国哀悼。在整洁美丽、生机盎然的平壤市，中小学生学习放学，不再唱歌，只是按居住小区排着队，整齐而默默地走着。平壤市内各机关、企业、居民住家的有线广播里，听不到欢快的乐曲。市内的影剧院门口看不到排队购票的人群。节假日的公园里，看不到在锣鼓声和手风琴伴奏下，翩翩起舞的欢乐场面。看不见机关干部和普通市民们上下班时喜笑交谈的情景，他们都默默地走在大街上走着，只是偶而简单地交谈几句。每到4月15日，金日成的生日纪念时，中央国家机关、平壤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手捧着一盆盆鲜花，庄重地摆放到平壤市郊的万景台金日成故居、万寿台金日成铜像前，以寄托他们对金日成的哀思。

3年的时光一晃过去了。从1997年9月初开始，平壤市的气氛发生了些许变化：公共场合出现了许多标语和口号；市内的有线广播经常播放《金日成将军之歌》的乐曲，平时很少打开的路灯入夜后也都亮起来了，市内各学校、工厂、机关都在赶排文艺节目。

进入9月中旬，根据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安排，“推举金正日同志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的活动首先从平安南道开始，在地方政府陆续举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钟玉、朴成哲，以及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们特意从平壤驱车赶到平安南道道府平城市，主持并参加了推举大会。紧接着，平安北道、黄海南道、黄海北道、江原道、慈江道、两江道、南浦市等地方政府相继举行了推举大会。最后压阵的是平壤市和朝鲜党、政、军中央国家机关举行的推举大会。9月23日，朝鲜人民军代表在平壤军方专用的“二八文化会馆”举行集会，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赵明录，总参谋长金永春，人民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金一哲等军队主要领导干部出席。在大会一致通过推举金正日为总书记的决定时，全体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

10月8日，一大早，平壤市突然沸腾起来：市中心的金日成广场上，工人们正在忙碌着检修扩音器，更换路灯。离金日成广场不远的万寿台金日成铜像前的平台上，摆满了平壤市民们敬献的鲜花，平壤市民穿着节日的民族服装出现在平壤大街……这是3年来平壤市第一次呈现出喜庆的气氛。

平壤时间上午9时，朝鲜中央电视台、朝鲜中央广播电台同时宣布，“稍候将播送重大新闻，请注意收看。”10时正，这两家媒体同时播送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特别公报》。《特别公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全党的意愿庄严宣布，推举我们伟大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消息传开，朝鲜全国一片欢腾，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集会。平壤市50万名青年学生在金日成广场举行文艺晚会。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全体出席，并登上主席台。朝鲜党政机关、人民武装力量部、社会团体、科教、文艺、新闻等机关也派了代表参加。

广场上欢快的乐曲响彻云霄，无数礼花飞向广场上空，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合着乐声欢快地跳起了舞蹈。专业文艺工作者们演出了文艺节目。

与此同时，平壤市内的“战胜广场”、烽火艺术剧场前的广场上，朝鲜人民军陆、海、空三军部队的官兵和公安部门的干部和战士也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1994年7月8日，金日成去世后，金正日的接班问题一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国际传媒开始对金正日迟迟不就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理解，各种流言满天飞。当1995年朝鲜通过各种途径正式证实了金正日为金日成同志守孝3年的消息后，各种谣言不攻自破。

朝鲜自古以来就有守孝3年的传统。这一习俗记载于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书中说父母去世后，长子及直系亲属在3年内需穿孝服、立殡所、祭灵位，称为“3年丧”。到了李朝时期，只有上层人物才能服孝3年，普通百姓只能服百日孝。李朝中期以后，普通百姓也可服孝3年。按“3年丧”规定，孝服直到死者满3年举行“大祥”仪式后，才能脱去。根据古时为父母守孝的传统，守孝期间，子女封官不能赴任，停止一切对外活动，不见客人，不发表谈话等。金正日在为金日成守孝3年期间，虽然没有会见任何一位外国客人，但实际上他一直在主持朝鲜党、政、军的工作。

金日成去世后，金正日作出决定，将金日成同志生前居住和办公的“锦绣山议事堂”改建为“锦绣山纪念宫”，并决定永久保存金日成同志的遗体，将他安放在“锦绣山纪念宫”内供朝鲜人民瞻仰。

金正日不仅提出了建设“锦绣山纪念宫”的设想，在施工过程中，他还数十次到施工现场进行视察和指导工作。纪念宫大厅正中，塑有金日成的大理石立像，后面背景是红彤彤的霞光。从

大厅墙壁和地面的装饰、石材的颜色、室内大型台阶的设计、灯光亮度、纪念宫广场前有轨电车的建设等，都是由金正日亲自决定的。

1997年7月8日，是金日成逝世3周年纪念日，金正日作出了改朝鲜年号的决定，将金日成主席1912年诞辰年为元年，新年号为“主体年号”，将金日成的4月15日生日定为“太阳节”。

金正日出生于革命世家，是金日成的长子。祖父金亨稷为反对日本对朝鲜的统治，于1917年3月组织建立了“朝鲜国民会”，这是在朝鲜较早建立的一个反日地下革命组织，其目标是争取朝鲜的独立。1917年秋，由于叛徒的告密，金亨稷被日本警察逮捕，投入大牢。出狱后，金亨稷继续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开展反日斗争，直到1926年6月逝世。祖母康盘石开始积极协助丈夫金亨稷工作，后来也组织了“反日妇女会”，成为朝鲜女性中反日组织的领导者。

金正日系金日成的前妻金贞淑所生。金贞淑1917年12月24日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鳌山德的一个爱国家庭，1935年9月在中国东北地区参加了由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革命军，1937年1月加入共产党，后与金日成结为伉俪。抗日战争时期，金贞淑曾多次参加与敌人的激战，也从事过地下工作。解放后回到朝鲜，怀着满腔热忱投身于朝鲜的恢复建设和统一事业。她于1949年9月22日英年早逝。1997年12月24日，是金贞淑诞辰80周年纪念日，朝鲜党、政、军各界人士在平壤和她出生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对金贞淑光辉的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金正日1942年2月16日出生于朝鲜两江道三池渊郡的白头山密营（1936年8月朝鲜人民革命军在白头山森林中建立的抗日秘密营地和指挥所）。朝鲜劳动党既定他为金日成的接班人后，营地后的山峰被命名为“正日峰”。山顶上矗立着用数百吨重的

整块花岗石雕刻的石碑，上面刻着“正日峰”三个大字。这里现已被朝鲜政府列为革命史迹地。

1950年金正日已到了上学年龄，金日成为了使金正日受到锻炼，将他送进了平壤红旗万景台革命学院。这是一所招收革命干部子女的学校，学员一律着军装，过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在校毕业的学生，既可上军官学校，也可直接上大学。金正日中学毕业后，于1960年9月进入朝鲜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学习，主修政治经济学，1964年3月毕业。1961年7月22日，金正日加入了朝鲜劳动党。大学期间，他还利用实习机会到军队和农村锻炼。1964年6月，他进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组织部的指导员、科长、副部长、部长等职。

金正日进入劳动党中央工作期间，除主管组织工作外，还分管宣传鼓动和文化艺术工作。他先后组织朝鲜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在他的指导下，1971年推出了歌剧《血海》，1972年推出了歌剧《卖花姑娘》，1982年为庆祝金日成70寿辰，他组织平壤市5000名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光荣之歌》等，这些作品主题都是歌颂金日成领导朝鲜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建树的伟功丰绩。

1973年9月，金正日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74年2月，朝鲜劳动党五届八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正式定为金日成的接班人。这次会议还首次把金日成的革命思想概括为“主体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的统一体系”，系统地提出了全面继承和发扬金日成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的问题。会议宣布，把“实现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作为朝鲜劳动党的最高纲领”，提出了“按照抗日游击队的方式生产、学习和生活”的口号，要求在全社会继续深入开展“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运动，一批又一批大学毕业生被分派到工矿企业、农村、机关和学校担任“三大革命小组成员”。从这时起，金正

日开始全面参与朝鲜党、政、军的中央领导工作。在1980年10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金正日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书记、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提出了在全党“进一步推进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口号，完成了奠定朝鲜劳动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组织安排。在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关于主体思想》、《主体哲学是独创性的革命哲学》等理论著作。他还抓了“全面改善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致力于科学研究，把朝鲜的科技水平提高到新的更高阶段”的工作。为此，朝鲜制定了提高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的待遇，对专家、教授和有特殊贡献的人给予“特供”的政策。从1982年2月起，金正日当选为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员。在这期间，他提出了“在全军实现主体思想化的方针”，提出了要使“朝鲜人民军成为领袖的军队、党的军队”的口号。1990年5月，他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1991年12月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1992年4月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体制的终结，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韩国相继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朝鲜南北方同时加入了联合国。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朝鲜及时调整了对南方政策，采取措施缓和朝鲜半岛局势。举行了南北方总理会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双方签署了《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

在对内政策方面，为了搞活经济，大力推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金正日指示并亲自主持会议，决定在朝鲜北部地区建立一个广泛吸收外资的自由经济贸易区，即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

这一决定被国际舆论和政治评论家们广泛视为朝鲜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信号和建立外向型经济的“一个窗口”。

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地处朝鲜北部的咸镜北道东海岸，与中国和俄罗斯接壤，利用区内的3个港口，这里可成为朝鲜通往世界的门户之一。按计划，自由贸易区内将设立6个工业区，兴建年产200万吨的炼油厂、被服厂、食品厂、木材加工厂、大型矿山机械、高精密机床厂；以现代化电子自动工业部门为对象，设立综合性现代电子电器产品的开发、研究和生产基地；以现有的原油加工工业为基础，建成化工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基地；建立汽车组装、汽车零部件生产和轻工业产品基地；建立从事木材加工业和轻工业生产基地等。

朝鲜宣布建立自由经济贸易区后，韩国、美国及西方一些工业国家纷纷去朝鲜考察或投资。其中最积极的要数韩国和美国的一些大公司了。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器公司、摩托罗拉公司、美国银行等都不甘落后。这些外国企业和银行，早在1994年8月就组成了经济代表团访问朝鲜，美国代表团还重点考察了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内的投资条件和环境，并与朝鲜有关官员讨论了美国企业进入朝鲜的事宜。

这三年多，朝鲜遇到了严重自然灾害，但朝鲜在外交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对外政策方面，朝鲜在改善美国关系的方面，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谈判，不仅实现了两国高层的会晤，也使两国签署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宣言内容包括：由美、日、韩为朝鲜兴建两座轻水反应堆。为建设轻水反应堆，韩国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已先后进入朝鲜境内施工。中国、美国、朝鲜、韩国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谈也已于1997年启动，并预定于1998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第二轮会谈。朝日关系正常化谈判的预备性会谈也已恢复，并就谈判日程达成原则协议。

在经济建设领域，朝鲜加快了北部地区的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建设。1996年9月，国际投资说明会在贸易区内